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绿色治理动因研究综述

陈秋璐

东南大学，江苏省南京市，211189；

摘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工具性视角，阐述了企业实施绿色治理的外部压力动机与内部工具动机，探讨了两类动机下企业绿色治理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对不同驱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和探索，以期深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认识，为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提升社会环境表现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绿色治理；驱动因素；工具性视角

DOI：10.69979/3029-2700.25.05.05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发展成为重要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由此，治理绿色化顺势而行。绿色治理是通过多元主体治理，利用创新技术、方法和模式等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进步协调一致（李维安等，2017）。宏观层面的绿色理念能否切实践行，取决于微观市场主体的应对策略。企业作为实现地方经济产出与治污减排的主要微观主体，应当成为践行绿色治理的关键行动者（宋丽颖等，2024）。

《绿色治理准则》指出，企业践行绿色治理一是应当积极开展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研发绿色技术，以及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的其他行动；二是要构建环境保护方面的绿色治理机构，负责指导和监督企业的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等。为促进企业参与绿色治理，了解企业绿色行为的动机至关重要（李维安等，2023）。动机是企业行为的核心驱动力，构成了企业行为的内在逻辑。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企业绿色行为的动因，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动因进行综述。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工具性视角，从外部压力动机与内部工具动机两个方面梳理企业绿色治理的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中可能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工具视角与规范视角

随着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的逐渐兴起，公司治理的范畴出现了显著变化，从早期仅关注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等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到将客户、政府、债权人等外部主体纳入研究视野，使其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Freeman, 1984；Donaldson & Presto

n, 1995）。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视角来看，Donaldson 和 Preston 强调了该理论提供的工具性与规范性视角。

1.1 工具性视角

工具性视角聚焦于利益相关者行为与企业传统经济目标（如盈利能力、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该视角遵循结果导向思维，认为采用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的企业在传统绩效指标上表现更好。工具视角的核心观点在于，企业的绿色治理行为实质上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战略工具。

1.2 规范性视角

不同于工具性视角单纯聚焦于经济层面的考量，规范性视角迈入道德与伦理的范畴。其基础在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具有内在价值，企业有道德义务平衡各方的利益。此时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是基于正确的道德判断，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关系更多依赖于信任、尊重和互利，企业的绿色治理行为源自对社会和环境的关心与承诺。

2 企业绿色治理动因研究综述

既有研究多从工具性视角展开，研究结论表明企业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环保要求而实施绿色治理，外部压力动机与内部工具动机均促进了企业开展绿色治理。

2.1 外部压力动机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企业开展绿色治理的一大重要原因是迫于外部压力。为了维持其合法性地位，获取外部环境中的相关资源（Suchman, 1995），企业采取一系列绿色行为。基于外部压力的企业绿色治理，强调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的影响。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机构投资者、公众与媒体、非

政府组织等。

2.1.1 政府

政府被认为是企业绿色治理压力的最大来源，它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环境规制的制度压力及政府补贴等绿色激励。现有研究表明，环境法规的约束（Aragon et al., 2020）、监管力度的提高（LI et al., 2023）监管形式多样化等（刘雪燕和张可，2023）是企业绿色行为的关键驱动力，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资、研发绿色技术等，从而提升绿色治理表现。此外，税收优惠（于井远等，2023；车德欣等，2023）、环保补贴（Chen 等，2014）、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张晓等，2022）、政府绿色采购（宋丽颖等，2024）等政府工具能够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提升企业进行环境污染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激发企业绿色治理动能。

2.1.2 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绿色投资者在驱动企业绿色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用双重价值的绿色投资者被视为激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机制（姜广省等，2021），是深刻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相关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坚持可持续投资理念，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企业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并提高绿色治理绩效（姜广省等，2021；张云等，2024）。同时，除了公开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也采取私下与企业管理层或控股股东沟通，如邮件往来、面谈等方式影响和优化企业的经营决策，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治理（宋肖肖等，2025）。

2.1.3 公众与媒体

在我国现代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社会公众治理主体的身份愈发得到重视。作为绿色治理的广泛参与者，社会公众通过信访、环境公益诉讼、舆论信息传播等“非正式监管”手段对当地政府施压，强化当地政府的环境监管力度等，从而间接驱动企业绿色治理（周阔，2024）。同时，作为“非正式监管”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媒体发挥着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积极的环境报道能够提升企业的声誉，激励企业持续开展绿色治理（黄莲琴等，2022）；而公开揭露和批评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等负面报道，对企业污染行为具有约束和惩戒效应（Tang & Tang, 2012），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绿色创新等，从而提高绿色治理表现。现有研究表明，公众与媒体对企业绿色治理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黄莲琴等，2022）。

2.1.4 环境非政府组织

环境非政府组织是专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民间组织，其向社会提供有关环境的公益性服务，旨在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肯定，其已经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推动企业采取更加环境友好型决策（Briguglio, 2017）。此外，这些民间组织推动的绿色认证（如“绿色工厂”）、ISO14001认证等（朱朝晖等，2023；吴龙等，2023）帮助企业建立绿色声誉并促进组织学习，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2.2 内部工具动机

不同于外部压力动机下企业被动地开展绿色治理，内部工具动机下，企业将绿色治理视为资源和机会，主动实施绿色行为，是一种内部力量的驱动。现有文献表明，企业声誉的提升与财务绩效反馈是影响企业主动践行绿色治理的重要动机。目前有关企业内部驱动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公司治理、高管经历与特质、企业特征三个方面梳理内部驱动因素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

2.2.1 公司治理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推动企业绿色治理的重要内部因素（李传轩，2023）。已有研究表明，股东集中度高的公司较少进行超出合规要求的环境活动（Berrone, & Gomez-Mejia, 2009），连锁股东的存在能够产生治理效应，促进企业的环境表现（Chen & Wang, 2021）；适度的董事会任期与规模、董事会多样性（如性别、专业背景等）能够提升企业的环境治理表现（Liao & Zhang, 2021），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董事会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并推动企业采取更积极的环境治理措施（Garcia & Martinez, 2017）；环境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更好地监督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有效提升企业环境表现（Huang & Chen, 2020）。

高管团队组成人员的异质性对企业绿色治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特征的高管能够多维度审视企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从而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绿色治理策略（Huang & Chen, 2020），形成持续性的绿色创新能力（Liao & Zhang, 2021），而高管的固定薪酬与企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高薪高管可能因更关注短期财务目标而忽视环境问题（Berrone & Gomez-Mejia, 2009）。

2.2.2 高管特质与经历

高管的特质与个人经历会影响其思维和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已有研究指出，女性首席执行官有望减少企业违反环境规定的频率（LIU C, 2018）；高

管的开放性人格（张琳等，2021；许松涛等，2022）、完美主义（李明等，2021）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行为，而短视主义（余伟和郭小艺，2023b）会导致企业忽视长期环境治理，对企业绿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高管的海外经历、学术经历、环保经历等影响其环境认知与决策行为。海外经历通过增强高管的环境认知与国际视野，推动了企业的绿色治理行为（Li & Zhang, 2010）；曾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型CEO促进了企业环境表现与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夏芸等，2023）；拥有环保背景的高管能够影响企业的环保价值取向，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治理表现（Huang & Chen, 2020；邱静和朱科威，2024）。

2.2.3 企业特征

企业自身特征也会对其绿色治理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现有研究检验了企业在特定情境或所处阶段下开展绿色行为的驱动机制。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研究表明，具有外部融资需求的企业以及面临负面舆情压力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以此降低资本成本并缓解负面报道对企业形象的冲击（Rehman A et al., 2023）；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投资于环境管理，从而获得竞争优势（Darnall et al., 2010）；企业声誉资本与绿色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特定的企业类型（如家族企业与集团企业）出于维护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往往表现出更优的环境绩效和更高的生态创新水平（Berrone et al., 2010）。

3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治理以提升社会环境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工具性视角，梳理了外部压力动机与内部工具动机下企业实施绿色治理的主要动因，为探讨企业绿色行为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参考。目前，关于企业绿色治理动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压力的影响，而关于企业如何自上而下将绿色治理理念应用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从而提升绿色治理表现的研究仍然较少。未来，更深入地分析企业文化、治理结构、数字化程度等因素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治理，以及不同动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Berrone P, Cruz C, Gomez-Mejia L R,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Do family-control led firms pollute l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0, 55(1): 82–113.
- [2] Darnall N, Henriques I, Sadorsky P. Adop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he influence of stakeholders and firm siz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6): 1072–1094.
- [3] De Villiers C, Naiker V, Van Staden C J. The effect of board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6): 1636–1663.
- [4] 姜广省, 卢建词, 李维安.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J]. 金融研究, 2021, (05): 117–134.
- [5] 李维安, 王琪, 牛建波. 企业绿色行为驱动因素研究述评与展望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3, 37(12): 1–10+137.
- [6] 史云贵, 刘晓燕. 绿色治理：概念内涵、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03): 1–11.
- [7] 张云, 吕纤, 韩云. 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监督效应与内在机理 [J]. 管理世界, 2024, 40(04): 197–221.
- [8] 黄莲琴, 刘光明.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提升公司绿色治理水平? [J]. 财贸研究, 2024, 35(12): 92–106.
- [9] 黄莲琴, 梁晨, 何蔓莉. 公司绿色治理：公众与媒体的力量 [J]. 会计研究, 2022, (08): 90–105.
- [10] 谢东明, 王平. 减税激励、独立董事规模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J]. 会计研究, 2021, (08): 137–152.
- [11] 李传轩. 上市公司绿色治理的法理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J]. 清华法学, 2023, 17(05): 146–161.
- [12] 王佳悦, 张启文, 范亚东. 连锁股东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了吗——基于ESG履责视角 [J]. 财会月刊, 2024, 45(10): 40–48.
- [13] 韩忠雪, 何露. 非国有股东治理、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 [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 21(06): 67–79.

作者简介：陈秋璐（2001—），女，汉族，江苏，硕士在读，东南大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